

担任抗战初期四川省主席王缵绪的最后窘境

王缵绪（号治易）究竟为国家民族做出何等贡献？当全国各省军系统一在各省首领时，而四川各系军阀仍处于 20 多年割据“防区制”状态中，却成为中央渗透最顽固的一省。随之日军侵华加剧，蒋考虑“西迁”，想把四川不断战乱的省市，变为抗战后方，其难度十分艰难，是军阀刘湘在不断阻挠，始未进展。

本文结合《蒋中正总统档案》《四川省政府公报》《新四川月刊》及台湾国史馆史料，结合这一转型的关键推动者是兼备文人素养与军政实力的王缵绪宿将；他原与刘湘、杨森为陆军“速成军校”同窗；但王缵绪是川军将领中唯一的一科举之人，而弃笔从戎，步入军校。对蒋入川问题，王缵绪是站在国家与民族立场高度，乃持蒋入川共同抗日。可多年以来，却将南京政府西迁重大转折叙事，忽视掉王缵绪在中央“整军”过程重要地位，于 1938 年接收南京国府西迁、“构建抗战陪都大后方”这三大关键环节，他所起到的核心作用。但多年来，对川军抗战论述，以混淆“刘湘系为整个川军领袖”与“中央统辖大部川军”本质差异，故意掩盖以王缵绪为首大部川军，是作为“国军主力”出川作战史实。在此，重点探讨三大问题：一，四川军政变动复杂脉络，蒋如何重用王缵绪突破刘湘阻挠，在王缵绪协同下蒋创办“峨嵋训练团”，蒋中正任团长、王缵绪长子王泽浚任中队长，父子均为蒋系心腹格局，推动大部川军整编为中央序列。二，在南京政府西迁过程，王缵绪化解地方阻力，构建四川战时军政体系。三，1938 年王缵绪在省主席任上，为抵挡日军入川所率川军进入第五、第六、第九战区作战实际过程，及他指挥各战区所创屡屡战绩等，印证川军从“地方武力”到“国家主力军”的转型，而揭示抗战前的四川军政变局斗争，还原抗战初的四川省主席王缵绪作为“大后方建设”与“前线指挥官”的双重角色，纠正对川军抗战历史认知偏差。

一、简述四川从“防区制”转为“中央化”的艰难程度

在中原大战后，四川依然是“防区制”——各系军阀以“防区税收”养兵，形成“兵越多越穷，越穷越扩军”的怪圈。其内部军事定位，是以同属“速成系”毕业的王缵绪、刘湘部、杨森为主要成员，但这三人始终保持独立，王缵绪非是刘与杨的部下一说。在刘湘与杨森开战时，而刘湘曾乞求王缵绪为他立下汗马战功，把杨森赶出四川。其后，刘湘又忌惮王缵绪，双方矛盾逐一显现。

在杨森被赶出后，于 1924 年王缵绪任成都总督时，大力修建“春熙路”、“太古里”等市政设施；另扩建“少城公园”，开创广场、体育场及通俗教育馆、图书馆等文体机构；其施政重点在建设落后四川，这与刘湘靠压榨民脂总发动内战，增强势力形成鲜明对比。王缵绪已获得川民在成都少城公园，设有“王公碑”，记载川中善举。（注：文革时毁灭）。

1928 年底，王缵绪变卖家产购买张家花园及大片谷地上百顷，延续五年建成巨大学府；是以个人投资创办《重庆私立巴蜀学校》共 23 年，（今巴蜀中、小、幼校前身）。

1932-1933 年，“二刘叔侄大战”，实则两败巨伤。在百姓一片哀呼下，王缵绪实不忍再看川民苦难，应消除刘氏一族后患无穷，他挥军将刘文辉部赶出川外雅安（落草为寇 20 多年）。而王缵绪始终在全川民众心中与其他军阀有本质差异。

1934 年，蒋谋划“入川剿共”。这时刘湘想东山再起，到南京乞求蒋的扶持，以“四川省主席”为名，采取以省府统一税收，打破“割剧制”，为获取税收，从表面上都归省府之列，但刘湘仍无力掌控全川局势，是在脚跟未稳，就与蒋形成了对立。但剿共以来，王缵绪展现作战指挥的高超本领，外加是秀才升为“奏奖举人”背景，成为蒋取代刘湘最佳人选。经蒋派驻四川专员程泽润呈电：“四川各军将领明白大义者，以王缵绪为首促成大部川将拥护中央。”这在蒋的视野中，王缵绪是重点拉拢对象，已秘密拉入“复兴社”，成为中央整军与掌控川军核心者，得到中央特权，参与整军设计，任王缵绪为中央党政训练团军事训练处长，收纳川、滇、黔军官及行政干部，提供《川康整军实施办法》与《川康整军方案》，达成中央收纳四川军队人事及指挥目的。与此同时，王缵绪靠他在川威望，迅速构建各地诸多“怜民社”组织，与刘湘“川人治川”形成对立为亲蒋阵营。在王缵绪取得绝对权后，如范绍增、陈兰亭与其结为亲家；以及许国璋、唐式遵、孙震、许绍宗、王铭章等诸将追随为两大阵营。

1936 年 12 月 12 日西安事变，刘湘向张学良转达杀蒋意图。王缵绪于 15 日通电全国，“要求速恢复领袖自由，俾得主持中枢。”24 日，他再次通电重申“拥护中枢、抗御外侮”，立场鲜明。在“七七事变”前，蒋加紧川军整军，成立“川康军事整理委员会”任王缵绪主任委员，王缵绪所部通过中央裁员、整军、训练、换装纳入国军，为中央调遣及拨发供给，在指挥体系上纳入中央统辖作战指令，在整军上有了重大突破，印证了川军部分转型。

而刘湘始终拒绝中央对他系整编，仍属地方军系。为抵制中央，刘系采取军事行动，在重庆两路口、菜园坝修筑工事，白天戒严、夜间演习；并扣押蒋派入驻川别动队；又与中央军校成都分校学员发生

武装冲突，要求“中央人员滚出四川”。王缵绪与蒋通电“要求出兵四川彻底解决刘湘，避免中其缓兵之计。”提出 7 月 7 日在重庆召开“川康整军会议”，动员各军长公开表示服从中央，实逼刘湘作出表态。刘湘虽口上同意，并要求出川条件是：“任第七战区司令”及“授予部队番号”等，蒋都允许。但刘湘说一套干一套，将武器藏于嘉定、宜宾等处，让所属部队持羸劣旧步枪，身着草鞋短裤，如同乞丐出川，是逼蒋给经费及武器目的。

1937 年 9 月 1-5 日，四川举行欢送各系军出川现场，归入中央军与地方军的服饰各异、出发路线不同。以王缵绪为首的川军，经频频作战，首战已夺回平汉铁路及交通战线，后与日军作战争抢弃守省市大量物资运川。

1937 年 11 月上海沦陷后，南京政府面临失守，决定西迁四川，遭到刘湘出川阻挠。蒋立即撤销刘湘等人军职，分化出川部队。于 1938 年 1 月 20 日刘湘病世，其残余仍以“川人治川”发起三个月暴动，反任张群主川，王陵基带头扬言：“张群敢来，大炮相迎”。于是，老蒋派专人到川协商，最终由全川各界人士商讨，一致推举王缵绪主持军政，蒋愿意接受。从 1938 年 2-4 月蒋多次电请王缵绪返川主政，王以卫国前战推辞；同年 4 月向全国发出，国民政府首任抗战初期四川省主席王缵绪通令，王缵绪从前线返川，铲除暴动，成立“四川省军管区”和“四川省保安机构”将军政统一在手，以及接收中央政府与弃守省市机构入川落脚，迅速构建抗战军政体系，彻底废除了旧军阀体制，改组四川政府，增设社会处、卫生处、地政局、禁烟督办公署等 13 个机构，逐将四川军政带入到中央正轨运行。

自王缵绪上台，就将王陵基发配江西，任邓锡侯和潘文华在省府下，为“绥靖正、副主任”闲职。王缵绪以吏治整顿贪腐，树立四川新风，规定公务员“不准应酬馈赠、不准大办婚丧宴席、不准接受万民伞”，设民众举报箱，以扭转川内“公务员生活腐窳”局面；他专门针对大头目，清查旧省财厅刘航琛贪腐，设立专案组进行大案查实，在刘湘任内“一年搜刮四五千万元”，省银行 120 万元资本去向不明。即使张群和张澜出面向王缵绪说情，往开一面，也遭到拒绝。为躲罪刑，刘航琛在刘文辉帮助下逃往香港。而针对刘湘任内“赋税预征至 1974 年”乱象，为减轻川民压力，王缵绪将赋税从“一年四征”减为 1938 年“一年二征”、1939 年“一年一征”，裁撤苛捐杂税 200 余种，减轻川民负担，推行“一户一石”积谷计划；仅举 1939 年洪雅县共捐粮 13030.93 石（折合 156 万斤），支持抗战。王在缵绪一上台就迎来难民入川大潮。日军为灭绝掉中华民族最后希望，派大量飞机轮番轰炸抗战大后方各个城市。这血雨腥风最惨烈期间，省主席带领全川百姓把自家粮做好送给饥民，拿自家布用来缝制衣服给饥民，让工人夜以继日生产

弹药武器，让农民加紧生产，促使工农兵学商勠力同心，连男女老幼尽数发动，“有力出力，有钱出钱”，为抗战救国贡献力量。

王缵绪在省主席任上兼有“四川省肃清私存烟土督办公署督办”重任，下令“定期限肃清私土，绝毒禁种”，以禁烟铲除军阀经济恶根为目的，尤以刘氏家族长期靠“种烟贩烟”发家，及刘文辉在雅安是靠种鸦片苟活，曾将种烟技术传至延安等行为铲除，被全国民众称其为“四川林则徐”。

1938年5月，由省主席王缵绪制定《四川省兵役实施计划纲要》，提出“征训合一”，将全川 800 万壮丁中 600 万纳入训练，训练出 300 万推向战场。其中包括新编第 88 军，以及陆续编入到第 29、30 集团军在前线作战牺牲损耗，为保障征兵公平，改订“壮丁抽签办法”，长子、独子、高中生暂缓服役；即通电全省各县“慰问军属、优待壮丁”，杜绝“贿买壮丁、虐待壮丁”。

与此同时，由王缵绪带动了全川军民配合与支持，在 1938 年 8 月国民政府完成入川就绪。四川正式成为全国抗战“陪都”大后方。王缵绪在《新四川月刊》首刊提出“天下已乱蜀未乱，天下未治蜀先治”，即成为战时四川建设纲领，他代表四川人民不断向中央政府提出：“建国先建川”政策，达到中央为四川播出巨大经费，给予各项建设外，其战时新政是支撑“陪都”后方四大核心举措；他陆续推出四十余项改革措施，围绕“征兵、征粮、禁烟、吏治”四大领域，为抗战提供了大量人力、物力与军力，在他占据全国各省顶峰权力之时，迅速打造川军为国家军备骨干实力。

也正由于中央政府入川，却引日军集中火力轰炸全省。省主席在应对空袭构建后方防空体系上，下了最大功夫。如 1939 年，日军为摧毁中国抗战大后方，制定“101 号作战计划”（为世界最大规模战略轰炸），目标重点是轰炸成都、重庆等重要地区。可王缵绪所主导构建的防空体系设施抵御了日军轰炸，他组织民工扩建新津、邛崃桑园、白市驿等机场（新津机场征调 16 县民工 10 多万人工，全靠肩挑鹅卵石铺设跑道）；并在成都城墙安装警报器，将警报分为“预备、紧急、解除”三类，乃公布于众。他制定疏散与救援事项，是在成都府河、南河架木桥，挖疏散通道；要求民众“闻警报即熄灭火烛，转移至防空洞内”，已组织医疗队救治轰炸伤员工作。据统计，1939 年日军对四川 143 个市县轰炸，投弹 1.3 万余枚，而王缵绪带领川民抢修防空措施，有效的降低军民伤亡。

在交通建设上，为解决物资运输难题，王缵绪成立川江航政管理处；在乐山、宜宾、泸州设下管理站，整治了川江航道（炸毁险滩、设置航标），推行“三段航行”（宜昌-巴东、巴东-万县、万县-重庆），使运输效率提升 6 倍。于 1938 年 10 月，在宜昌积压 9 万吨工业物

资（占全国工业精华 90%）、及 3 万主要人员。况且，王缵绪在省主席任上仍率部与日军作战，授予武汉外围总指挥，率军拼命争抢物资，以指挥作战来保证安全下，掩护卢作孚民生公司顺利将大量物资人员运川，保住了战时工业命脉。

曾在 1938 年 8 月 14 日省主席在成都、绵阳、广元等五地设置救济战区难民婴孺寄托所，专门收养哺乳者及 5 岁以下儿童。直到 1939 年 9 月 30 日，还有陕西难民大批来川，由王缵绪成立的“四川省赈济委员会”拟订配置办法，少壮者分发昭化、广元、剑阁、苍溪、阆中等 10 县安排工作，老弱者由广元县收容所收容。同年 10 月剑阁县难民收容所成立，随即收容鲁、豫等地来川难民 250 名。如 1939 年冬，位于西安大华秦厂遭日军轰炸，大量纱机及厂屋被炸毁，王缵绪决定在川陕甘三省交界处广元地区，迁大华纱厂建在广元为分厂等诸如建厂、建路、建房、民事、征兵及军政事务样样要管。

王缵绪作为抗战极其重要者，在历史上具有三重特殊性：文人与武将结合，是出于他是清末“奏奖举人”，有别于“不学无术武夫”，能以行政建设代替武力割据，以制度改革化解地方阻力，使四川从“割据之地”变为“抗战后方”基地，并作到后方与前线统筹，既主持了整个四川建设，保障人力物力供给，又亲率部队在正面战场作战，以及实现了后方支援前线，前线保卫后方”的良性互动，这在民国地方将领中极为罕见。从更宏观的视角看，王缵绪的实践揭示抗战初期中国“国家统一”的艰难路径：其一，地方势力的“中央化”需依托“文武并重”的领导者，单纯的武力压制或政治拉拢难以持久；其二，大后方的建设不仅是“物资积累”，更是需“制度革新”与“民心凝聚”，而王缵绪反腐反贪及禁烟、提升川盐产量等一系列举措，以及吏治改革正是抓住了这一核心；其三，将军阀体系改革，成为“国家化”更是正面战场取胜的关键，这也是抗战初期四川能成为“复兴民族根据地”的根本原因。

从 1938 年以来，王缵绪在省主席任上仍负责川军正面战场作战，他始终未脱离前线指挥。其核心部队第 29 集团军作为“中央统辖川军”，先后在第五、第六、第九战区奋战过程，以“守护大后方”反击日军侵略，是由他作为我国三大最主要战区指挥。

为保四川安危，于 1939 年 10 月王缵绪在省主席任上请缨出战，并作为中央集团军总司令授予“驻守四川屏障封疆大吏”，再次率 8 万川军将士奔赴湖北前线与第 29 集团军会合，他率先向日军发起“冬季攻势”大战，所在第五战区（直听命于蒋介石，非属李宗仁指挥）。

此后，日军计划“第一步占随县、枣阳，第二步占襄阳、樊城”，王缵绪率部驻守平汉路，成为日军重点攻击目标。其战略部署：将部

队分为“正面防御、侧翼袭扰、后方游击”三大部分，利用平汉路沿线地形，破坏日军交通线，阻止日军师团进攻随枣地区，取得胜利。

在 1940 年 1 月战地记者采访李宗仁，他称“王缵绪所率川军部署是第五战区半边天”。同年 5 月进入“枣宜会战”，李宗仁令“各军转移新防区”，但王缵绪率第 29 集团军，作为一支孤军，引日军入大洪山区作为战场，他巧妙利用“丛林战术”，拖垮日军机械化部队，使日军现代化坦克大炮无法进山，经一年零六个月无数战役，王缵绪创下了“大洪山反扫荡歼灭战”的诸多经典战例，被全国军民以上将王缵绪姓氏，著称“大洪山老王推磨”，歌颂他终止日军西进入川。

于 1942 年 10 月日军从第五战区失败转移第六战区，蒋急调王缵绪上将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 29 集团军总司令”，授予战区指挥（调陈诚为远征军入缅）。此时，第六战区辖鄂西、湘西、黔东 81 县，是“拱卫重庆的东部门户”。因战区空虚，由军委将汪之斌第 73 军、余济时第 74 军、施中诚第 100 军纳入第 29 集团军建制。

从 1943 年初，日军师团首向江防前沿阵地向川军第二十九集团军发起猛烈进攻。王缵绪作为第六战区指挥官，将该战区陆续展开鄂西、石门、慈利、石牌、常德等重大战役，总是把川军放在前沿重阵为主力军，自然伤亡惨重。

如 1943 年 5 月鄂西会战：日军调集 7 个师团、1 个独立混成旅团（约 10 万人），企图攻占石牌要塞，打开重庆门户。王缵绪部署：前沿防御令第 44 军（长子王泽浚任军长）驻守安乡至公安一线，他开闸放洪水阻击日军进攻，敌重型武器陷入水中共报废，使鄂西会战保住了川江航道，确保陪都大后方的物资运输畅通，蒋在战后电贺王缵绪“指挥有方，功在国家”。并在 5 月 25 日蒋严令“坚守石牌”，王缵绪强调“第 29 集团军是国家骨干，民族灵魂，非私人武力”，川军在各役中“拼死抵抗，王缵绪利用“悬崖峭壁”设伏，以“滚石+火网”封锁缺口，日军“不到 30 分钟伤亡 100 多人”，最终被迫撤退。随后，王缵绪率部在渔洋关与日军激战，28 日夺回渔洋关，第 44 军军长王泽浚击毙日军大队长皆冢义昌，并截断日军第 13 师团退路。

1943 年 11 月，日军第 11 军司令官横山勇调集 7 个师团、1 个独立混成旅团（约 10 万人），发起常德会战，目标是攻占常德这一“川东门户”，切断重庆与华中的联系。时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 29 集团军上将总司令，全权负责洞庭湖以西及常德外围防御，其指挥策略可概括为“三线防御+精准反击”：前沿阻击是依托河道的“水上封锁”战术为阻止日军从南面沅江水路进攻，他提前实施两项关键措施，河道沉船封锁，将木船系上铁锚沉入沅江关键航道，形成天然屏障，阻

断日军汽艇突击队行进；用石油火攻防御，在日军强渡江面预设石油灌，一旦日军接近遭火燃烧，利用火墙迟滞日军进攻。

11月18日，日军第3师团中烟护一联队率汽艇队强渡沅江，因江面封锁与火攻阻击“伤亡过半，被迫撤回南岸”。据1943年11月19日第六战区战报介绍：“王缵绪通过无线电话协调中美联合空军，调派2架P-40战斗机精准轰炸日军联队指挥部，第二十九集团军第44军击毙中烟护一及2名联队长，直接打退日军南线进攻力量。11月21日第44军第150师师长许国璋率部在陬市西北阻击日军，身受重伤殉国，以死践行战区长官王缵绪“严令不许撤军”指令。由王缵绪急电向蒋汇报战情，蒋回复“特恤十万激励该军”，第六战区政治部主办的《阵中日报》以“常德保卫战：川军血染沙港”为标题，报道战役重大胜利。

11月23日，日军第116师团第109联队进攻常德西北外围据点沙港，第44军军长王泽浚顽强抵抗，使敌较大伤亡，无法前进。经日军调整部署总攻时，第44军炮击日军指挥部，布上照一与联队参谋田原弘夫阵亡，由铃木兼雄代理联队长。12月中旬，王缵绪指挥第二十九集团军与友军配合，收复常德外围所有据点，日军“攻占常德、威胁重庆”的计划彻底破产。此战歼敌3000余人，缴获武器300余件。正如《阵中日报》评论所言：“常德会战之胜，使盟军确信中国能拖住日军主力，为全球反法西斯战争争取时间。”

但七十多年来的叙事，已将“常德会战”指挥归于孙连仲，实为史实错误。孙连仲无军，失去实际兵权，以诸多档案战史证实王缵绪为战区副司令长官调入，接任陈诚指挥第六战区各部，所有作战电文均“直达重庆蒋委员长，未有向孙连仲报备”。

1944年初，日军在第六战区失败转第九战区，蒋又调王缵绪任第九战区上将副司令长官，一是制约薛岳；二是依托王缵绪第44军主力保卫湖南遂川空军基地。同年5月27日“第四次长沙会战”打响，薛岳不出三失守长沙，蒋撤掉薛职、枪决其手下军长一名。蒋令王缵绪继续指挥“长衡会战”，而随王缵绪到第九战区第44军为战区直属部队，（下辖149师、150师、161师、162师），驻守湖南湘阳、浏阳、茶陵等地区，堵击日军向江西永兴进犯。第44军军长王泽浚听命其父王缵绪指挥，不归其他节制。该军展现出强劲战斗力，他率部在茶陵、攸县与日军师团激战，却生俘了日军中尉队长镀边信雄等20余人，歼敌3000余人，缴获武器300余件、战马100余匹，成为第九战区“歼敌最多的军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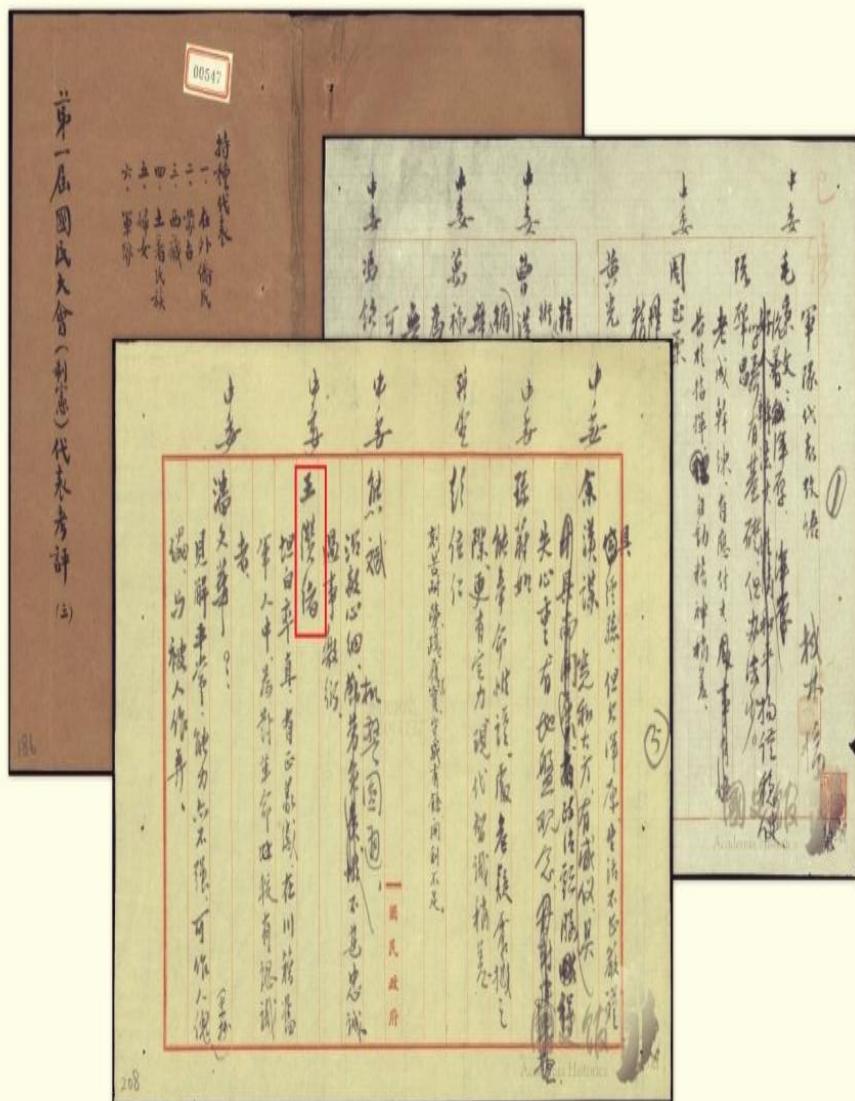
1944年7月5日，日军企图迂回进攻遂川空军基地时，王泽浚率部“在安仁地区顽强堵击”，虽自身伤亡惨重，仍配合友军完成保卫任务，确保中美联合空军战机正常起降，为后续“芷江会战”的胜利奠定基础。

1945年1月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报告：“第44军成为第九战区，不可或缺的主力”。因第44军为“川军王牌军”，在八年抗战以来，战绩卓著，该军不仅是国军中第一批换上美械装备部队，特授予本军“被服局专属生产经营权”，这意味着第44军可自主生产军服、装备，无需依赖战区后勤调配，其作战能力提升为独立部队。

1945年6月6日，由军事部特任王缵绪上将兼“湘鄂赣边区总司令”，负责进剿该区域日军师团，经王缵绪指挥各军作战到抗战胜利。据同年8月10日王缵绪致蒋电内容：证实王缵绪上将采取“分区清剿+收复方略”；尤其是指挥第44军与各军先后收复江西宜春、湖南醴陵等10余座县城，彻底肃清湘鄂赣边区日军残余势力。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据统计：王缵绪第29集团军在抗战期间共出川将士20余万将士，歼敌5万余人，是川军名副其实的国家抗日强军，牺牲最多、战功卓著、名声最响，标志王缵绪上将八年抗战的指挥生涯。

当抗战全面胜利，国民政府立即启动机构调整：战区改绥靖区，将原12个战区均改称“绥靖区”由司令长官、副长官执掌辖区军政，直接受军事委员会管辖；即设立五大行营：东北、北平、西北、武汉、广州行营，作为蒋介石“巡视地方军政的驻地”，行营主任多为蒋心腹将领。这说明王缵绪在抗战以来凭其屡屡军政功绩，仍为四川军政最核心人物，被任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武汉行辕副主任”（主任为程潜），同时保留“四川省军管区总司令”职，形成“跨区域任职”的特殊地位。这一任命深层逻辑是：蒋既需王缵绪制衡武汉行辕主任程潜（为桂系背景，对其不信任），又需他稳定四川局势因“前线将士返川入驻省市机构”，已架空行政官员，就是省主席都闲在家中。





圖四 第一屆國民大會（制憲）代表考評，王纘緒為軍隊代表之一。南京國民政府原定 1936 年 11 月 12 日召開國民大會制憲會議，然因抗戰爆發，會議一再延期，直至戰爭結束後才舉行。制憲國大代表於抗戰前已選出，10 年後其代表資格仍然有效。（來源：國史館）⁷

据 1945 年 10 月四川省政府报告介绍：“唯有王纘緒能以“抗战功臣+川军领袖”的双重身份镇住局面，体现王纘緒仍起核心作用。”这在 1946 年 3 月《蒋中正日记》，足见对其依赖。

1946 年 9 月，国防部颁布《绥靖区施政纲领》，强化“以军控政”格局。王纘緒仍是四川军政控制者，担任“武汉行辕副主任”、“重庆绥靖公署副长官”、“四川省军管区总司令”三职，掌控军政、民政、军事大权，是民国以来四川历任最高权力与稳固的一位。蒋要排除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残余势力，他在其中扮演“平衡者”角色。

在国府还都之际，蒋任王缵绪“南京卫戍上将总司令”，被王拒绝理由是“为四川贡献”，仍任“重庆卫戍上将总司令”。但蒋时常与王缵绪通电或嘱他南京面叙。当国共内战兴起，四川军政事务皆由王缵绪裁决，为巩固四川军政控制，清除异己，同年6月王缵绪电告蒋“立撤王陵基省主席职”。（注：王陵基贬江西9年都毫无作为，在江西恶名昭著被赶回川，于1946年“省主席”虚名。）

据1948年《新四川月刊》评论“蒋总统在四川最可依赖人选是王缵绪上将，据《现役军官资绩簿》记载，获二等云麾勋章、忠勤勋章等，是靠“抗战功绩累积晋升上将军衔”；在国共战争中，是国民党在职上将，唯一掌握四川大陆、拥有百万军队的强大力量。

1949年1月经国民政府调整西南战略，将“重庆绥靖公署”改称“西南军政长公署”，由张群任军政长官、王缵绪任副长官；因张群与王缵绪不和，张很快失权，蒋钦定王缵绪为“驻守四川人选”，授予“成都战役”主帅，负责抵御解放军入川。蒋让王缵绪手持八千国民政府委任状，将三大战区及胡宗南败退入川将士纳入麾下，已达上百万军队和未能带台的全部重武器在手。在蒋撤离后，王缵绪将军政各部简称“治总”司令部，以总司令名义统领全川，城里城外都有无数卡播着“治总”旗帜，载满手持机枪特种部队来回巡逻，如成都市区秩序正常运行，连小偷都不敢出没。中共几次派专员归劝，都被王缵绪扣压，他不愧是信心满满地给毛泽东信中提示“适可而止”。因共军难已突破蜀地，中共特派王缵绪嫡长孙王复加（民盟骨干）回到祖父身边劝说，同年11月王缵绪致“淮海战役”受伤被俘的长子王泽浚信中写道：“川为吾乡，民为吾本，若战，则川毁民亡；若和，则川存民安，吾当以民族大义为重，弃私怨而顾全局。”于1949年12月25日，由王缵绪在成都召集四川党政军各界（包括官员、商人、士绅、民间机构与民众等），正式向全世界宣布：“四川和平解放！”即阐明“和平解放的必要性”，谈到四川百姓历经抗战与内战，早已厌倦战火，为不分裂国家与民族成为共识。在12月30日王缵绪又召集党政军各界代表及中外记者，宣告三项核心内容：1、绝不让国家分裂，不做民族罪人；2、在军事安排上，令所有驻川国军部队即日起向解放军西南军区报到，听候改编；所有武器装备、军事设施，完好移交，不得损坏；3、让四川省政府及各级地方机构，保持正常运转，配合解放军接收，保障百姓生活安定，维护社会秩序”。

1950年1月，国民党在大陆最后一位上将王缵绪主动移交部队与权力，从“抗日将领”到王缵绪宣布“四川和平解放”。他为避免战火，保护百姓，保护了四川西南大省。若继续发生战役，将导致数十万百姓伤亡、经济崩溃，他认为和平解放使四川完好无损地，为后续西南建设奠定基础，主张国家统一，他这一举打破蒋介石‘固守西南、

伺机反攻幻想”。据 1950 年 1 月西南军区报告据统计：王缵绪此次移交部队上 100 万将士，武器装备包括火炮 500 余门、枪支 10 万余支、弹药库 20 余座，以及重庆、成都等地军事设施，为解放军快速稳定四川局势提供重要支持。

（注：官方拍摄解放大西南影视剧，想必是查过历史档案，蒋是把驻守四川交于王缵绪上将；而并非是胡宗南。胡宗南是 1945 年抗战胜利后授中将加上将衔。国共内战他拥兵五十万控制陕、甘、宁、青“国统区”，遭到解放军沉重打击，被迫率残部逃到四川。由王缵绪将其部属纳入麾下，他与蒋逃入台湾。事实上，抗战后，王缵绪仍是四川头把交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辕副主任兼重庆（陪都）卫戍总司令等职，十年后经考评仍属军政第一代表人物。根本没有闲在家中。况且中共执政后，他把家藏都全部用三大卡车，分别送交三大博物馆，带动成立“重庆三峡博物馆”前身。每天都按时去工作，并非是文中所述得罪人太多，不敢出门，须要他们为其保镖。）

解放大西南：王缵绪不把蒋介石放眼里，老蒋却夸他是“乱世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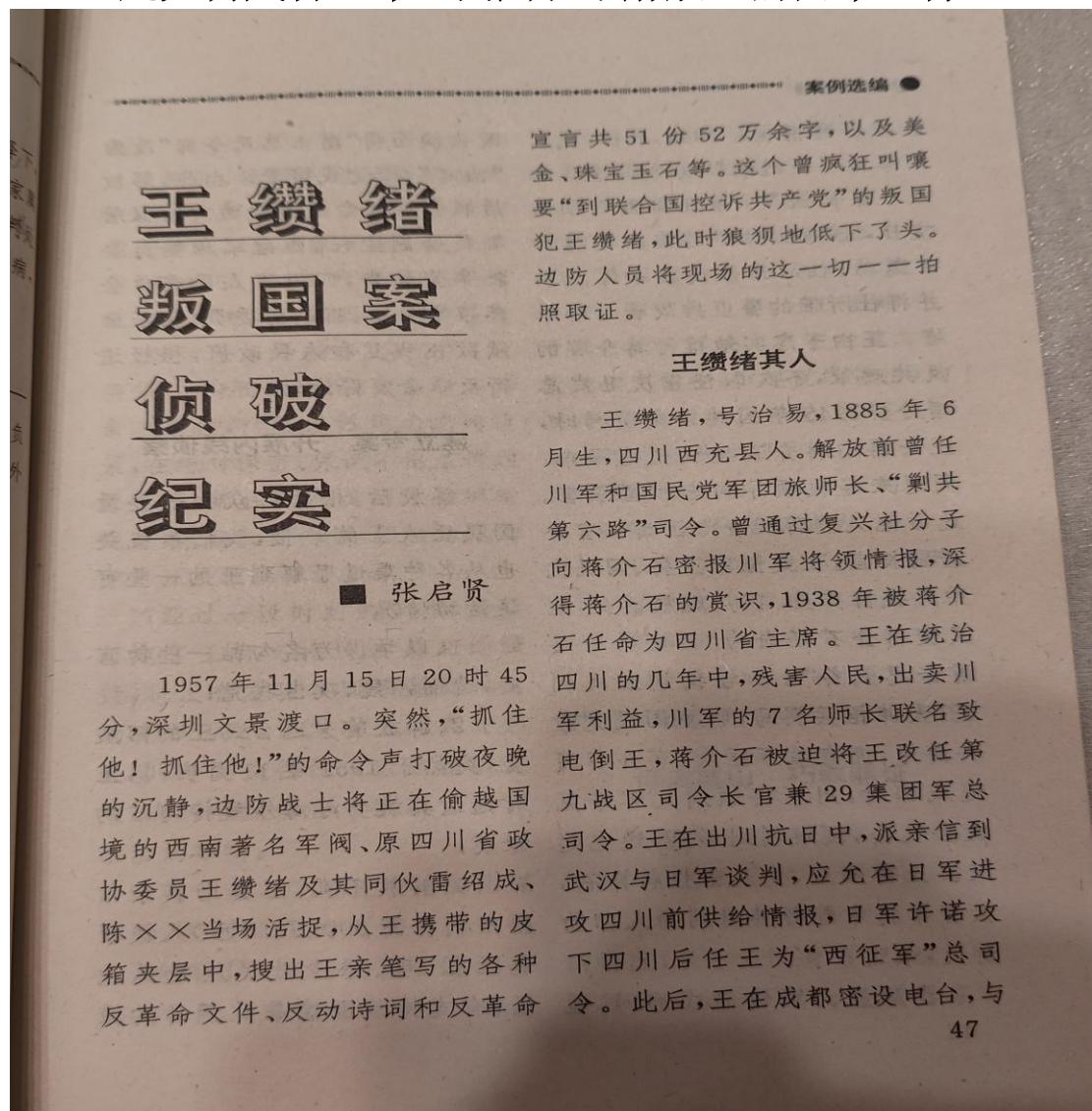
蒋介石离开大陆前任命王缵绪为四川省主席，要求坚守四川。

可以肯定王缵绪一生，贯穿于清末辛亥革命战争、军阀战争、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他在四川军政不同的关键阶段，以治理四川、发展教育为主，推动旧军阀体制改革，减免赋税，建设交通，构建抗战陪都大后方体系，使四川从“割据之地”变为“复兴民族根据地”。将川军“中央化”，全面推向战场，经他指挥我国最主要三大战区各役，共歼敌五万余人，使整个川系部队成为国家抗日强军。尤在国共内战末期，他以“民族大义”为重，拒绝分裂国家，宣布四川和平解放，为中国统一与西南稳定作出巨大贡献。其经历提供重要启示：首先地方势

力的“国家化”是实现全国统一的关键，王缵绪通过整军、改革，将川军从“军阀私兵”转化为“国家军队”，为抗战发挥巨大作用；他不仅在于作战，更在于守护百姓与民族利益，为保四川不被日军入侵，王缵绪在省主席任上请缨出川。指挥国军抗战拼死抵抗，使四川安然无恙，未进一兵一卒。并在国共内战最后，选择和平解放四川，他始终是以“川民福祉”为核心，不顾私利与名声。这都是在他能守住四川阵地优势下，绝非是无能败将，即考虑国家不分裂与民族利益团结出发，作出和平解决四川的重大问题，更是中国实现国家统一的深层原因。

据 1950 年《人民军队建设报告》中介绍：“王缵绪移交的部队中，包含大量军事技术人才（如通信、雷达、航空、后勤专家），这些人才随后被中共纳入军队建设体系——如第 44 军美式装备专家参与解放军装备改造，后勤专家帮助建立野战被服厂，医疗人员参与军队医院筹建，为新中国军队现代化与正规化作出重要贡献。

二、是如何残害宣布“四川和平解放”的国军上将



(注 47 页介绍：从 1955 年受民主人士张澜指使，秘密成立专案组，其主要成员张启贤把整个过程写为《案例选编》作者张启贤，1930 年出生安徽广德县，1949 年上二野军政大学，1950 年资中公安局工作，1951 年内江市公安局侦审股任副股长，1954 年调四川省公安厅一处五科，1956 年任副科长，1957 年抓捕王缵绪，1963 年任科长。)

1965 年调重庆市公安局搞“四清”，1966 年文化大革命被审查，1968 年到省公安厅军管会 57 干校学习劳动，1971 年恢复工作，8 月恢复科长，1975 年成立侦察队调任队长，1978 年任分队科长，1980 年任省公安厅侦察队副队长，1981 年派成都市公安局任工作组组长，1983 年组建省公安厅国家安全一处任副处长，1987 年派重庆市公安局担任工作组组长，1990 年 8 月以正处级副处长退休。

● 案例选编

日方密通情报。1941 年初，我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李先念派参谋长杜石公去王部商谈团结抗日，王将杜扣押送重庆向蒋介石邀功（杜后来叛变参加军统），并将杜所带的警卫排战士全部杀害。王由于忠实地推行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不久即任重庆卫戍总司令。1945 年国共重庆谈判时，王一再向蒋介石建议把毛泽东、周恩来等我领导同志扣留杀害。此后他又被蒋任命为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王是陆军上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四川解放前夕，他又被蒋介石任命为“西南第一路游击总司令”，誓与我党血战到底，大肆招兵买马，收罗国民党散兵游勇，拥有数万匪众。蒋介石溃逃成都时，川军将领刘文辉等见大势已去，便策划到彭县，通电起义。王得知后，先是密报蒋介石，接着奉蒋令赴彭县对刘等人归劝游说，未逞。

我解放大军进逼成都时，他

改头换面将“游击总司令部”改为“治总”，接受我接管。由此，解放后我先后任命他为川西文物保管委员会副主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室参事，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参事、省政协委员。但王继续敌视我党和人民政府，积极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

建立专案 开展内线侦察

解放后，根据群众和一些爱国民主人士的举报，我侦察机关也从各种渠道了解到王的一些可疑活动情况：

- 1、以学佛为名勾结一些伪官吏，造谣诬蔑、攻击我党；
- 2、解放前夕逃台的王的四姨妾，突然于 1951 年 11 月回川，王有通过其姨妾与海外敌特勾结的嫌疑；
- 3、解放不久，王资助其亲信秘书刘梓衡 500 万（旧币）人民币逃至松、理、懋少数民族暴乱地区，有支持叛匪搞暴乱活动的嫌

(注 48 页介绍：因抗战以来王缵绪上将名震天下，他作为四川省军管区总司令治军严厉，强调军队无论作战打到何处，都要以保护民众为重，不准伤害百姓。但李先念在鄂豫皖边区冒充王缵绪率部进村烧杀掠夺，顾意破坏王缵绪及川军名声。至“皖南事变”，王缵绪以上将总司令在双河假以召开联度“军事会议”，邀新四军独立游击队司令员李先念到会参加。按理是高抬李先念，可他心虚，不敢到场，让参谋长杜石公带一连人前来，当场扣留送交第五战区李宗仁，让他送往重庆交蒋处理。王缵绪见李先念不到，命第 67 军 161 师 481 旅旅长朱再明，去偷袭李先念驻地葵花寨及芭蕉冲，将李部赶出所在地。对这一事件在一次军事会上，特邀上将王缵绪给军官介绍他作战经验及取得屡屡战绩，王缵绪还特意讲述这段历史，已存入档案中。)

案例选编 ●

据此，我们认为王缵绪有混入统战内部搞反革命阴谋活动的重大嫌疑。为了保卫统一战线工作，于 1955 年 11 月报经公安部批准建立专案。根据王反动历史长、政治斗争经验多、又有“起义将领”的身份等情况，我领导干部亲自掌握，严格遵循党的统战政策，在绝对保密、保证不出差错的原则下，抓住已发现的三条嫌疑线索，采取长期打算，积极谨慎的方针开展侦察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虽然否定了王有支持民族暴乱的嫌疑，也没有发现其四姨妾有具体的犯罪活动，但发现王确实思想反动，与其交往的人政治情况复杂，有纠合反动分子搞政治阴谋活动的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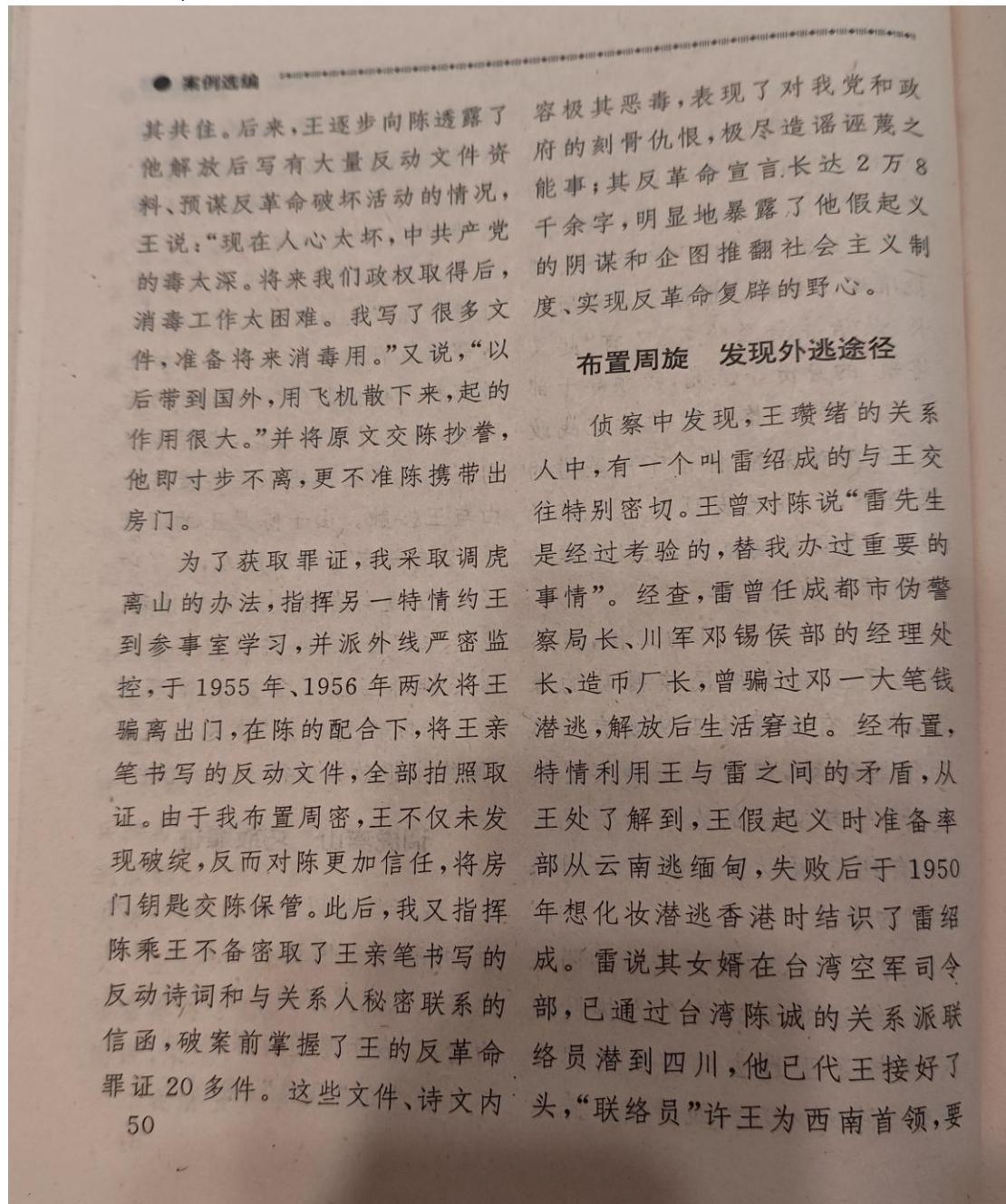
为了深入了解王缵绪的阴谋活动，经过对王的关系人排队摸底，选择了王过去的游击总司令部高参陈××为内线特情。陈系

袍哥头子，文化高、善绘画和拳术，解放后表现较好，主动交待了自己的历史问题，并揭发了王缵绪的罪恶，有争取他为我工作和深入侦察王的条件，遂将陈建为特情。陈家人口多，经济困难，生活需靠政府解决。我在对其加强教育和严格控制（建复线特情）的同时，给他以经济资助，指挥他以向王寻求职业和要求经济接济为由与王接触。由于陈是王的旧部属，又有一定的活动能力，为了收买陈，王遂向省统战部写信推荐。我暗中配合，立即建议省委统战部安排陈当上了省文史馆研究员。陈即假意向王“谢恩”，表示“愿终生报效”，取得了王的信任。

调虎离山 巧取罪证

我指挥陈以学佛为名拜王为师，并利用王因过去作恶多端怕受害人找他算账而不敢轻易外出的情况，表示愿随身保护，成了王不可缺少的“保镖”，搬到王家与

(注 49 页介绍：专案组内线侦察所指民主人士张澜、陈 XX 指陈子庄，陈仅是王缵绪身边多年侍卫，说白了就是家奴，没给他任何军职。当蒋介石打电话到王缵绪家“告知军统要抓张澜前，必须要让四川省军管区总司令兼四川省保安总司令王缵绪所知”。而陈子庄偷听到，告张澜逃掉，为此陈被军统查出服刑二年，出来一直无业。事后，张澜与陈子庄为好友。张澜与王缵绪同为西充人，却因王缵绪文武双全，在抗战以来风光无限，上马能打仗，下马能持政治理军政，这不仅让张澜羡慕嫉妒恨，况且是国民政府嫌疑通共分子。而中共执政，他作为民主人报复王缵绪，提供三条罪，经调查都不成立，借陈子庄与王缵绪多年老关系，用非法手段入住家中二人配合，偷窃王缵绪诗集与友人信件等，说成是反动材料。)



● 案例选编

其共住。后来，王逐步向陈透露了他解放后写有大量反动文件资料、预谋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情况，王说：“现在人心太坏，中共产党的毒太深。将来我们政权取得后，消毒工作太困难。我写了很多文件，准备将来消毒用。”又说，“以后带到国外，用飞机散下来，起的作用很大。”并将原文交陈抄誊，他即寸步不离，更不准陈携带出房门。

为了获取罪证，我采取调虎离山的办法，指挥另一特情约王到参事室学习，并派外线严密监控，于 1955 年、1956 年两次将王骗离出门，在陈的配合下，将王亲笔书写的反动文件，全部拍照取证。由于我布置周密，王不仅未发现破绽，反而对陈更加信任，将房门钥匙交陈保管。此后，我又指挥陈乘王不备密取了王亲笔书写的反动诗词和与关系人秘密联系的信函，破案前掌握了王的反革命罪证 20 多件。这些文件、诗文内

容极其恶毒，表现了对我党和政府的刻骨仇恨，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其反革命宣言长达 2 万 8 千余字，明显地暴露了他假起义的阴谋和企图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反革命复辟的野心。

布置周旋 发现外逃途径

侦察中发现，王缵绪的关系人中，有一个叫雷绍成的与王交往特别密切。王曾对陈说“雷先生是经过考验的，替我办过重要的事情”。经查，雷曾任成都市伪警察局长、川军邓锡侯部的经理处长、造币厂长，曾骗过邓一大笔钱潜逃，解放后生活窘迫。经布置，特情利用王与雷之间的矛盾，从王处了解到，王假起义时准备率部从云南逃缅甸，失败后于 1950 年想化妆潜逃香港时结识了雷绍成。雷说其女婿在台湾空军司令部，已通过台湾陈诚的关系派联络员潜到四川，他已代王接好了头，“联络员”许王为西南首领，要

(注 50 页介绍：于 1955 年成立专案组是非常绝密，不许对外讲。因王缵绪还在高位，特给统战部负责人写信给陈子庄安排工作。而专案组成员张启贤当时仅是省公安厅一处五科副科员，调查是不敢泄密。并文中谎称“解决陈子庄工作是他起作用”，把王的作用放在自己头上。另非法入户窃王的通讯录查“雷绍成与王缵绪关系密切”，因雷原任省警察局长是王安排的；接着文中说“利用二人矛盾”前后不符，到底密切，还是矛盾？更离谱所指“1950 年王缵绪逃香港结识雷绍成”。最违背历史称：“王缵绪假起义”！可这一事实由王缵绪亲自，在成都向世界公开宣布“四川和平解放”！已载入史册！)

王等待时机，将来配合美军反攻大陆，必要时还可派飞机将王接走。王虽然没见过联络员，但见雷说得有声有色，便信以为真，把外逃的路子寄托在雷的身上，对雷优礼厚待，并积极书写反动文件作为叛国活动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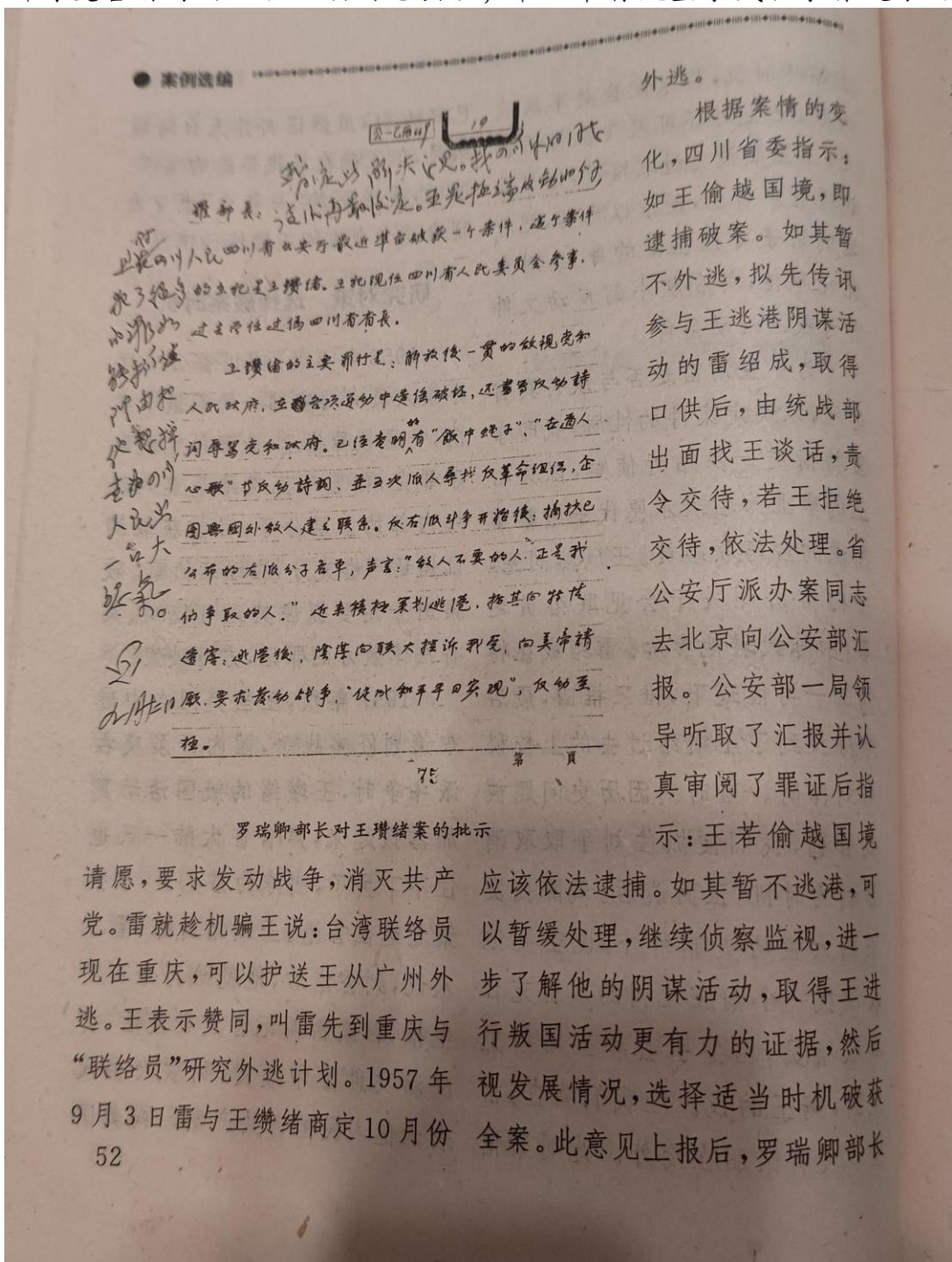
为了查清雷是否与敌特真有勾结，以确定案件的性质，我即布置特情进一步贴近侦察，以关心王的事业为名表示愿代王考察雷所说的台湾联络员。王欣然同意，并向雷讲明关于会见联络员之事，由陈代表他参加。雷绍成在特情的一再催逼下，推三推四，最后带陈找到了王缵绪过去的上校秘书刘梓衡。当时刘因历史问题被我管制，我们便抓住刘争取取消管制的时机，正面谈话。刘除揭发王的大量历史罪行外，说雷要他设法找一个南腔北调的人冒充台湾联络员，由他引去和王缵绪见见面，骗王的钱。经我们调查，雷根本没有亲朋在海外。此时案情已经大白，虽然证实并无台湾联络员，但王确在寻找外逃的途径。同时，我使用的“一号台”也曾发现台湾专电查问王缵绪的情况。

案例选编 ● 研究对策 选择破案时机

1956 年 8 月，四川省公安厅办案人员向公安部一局汇报了案情，一局领导指示：此案虽已获取了罪证，但鉴于王缵绪是混入统战内部的上层分子，目前获取的证据还不够充分，应继续侦察。破案时一定要抓住其无可狡辩、具有法律效力的罪证，方可破案。

1957 年秋，正当美国在中近东策划侵略战争，国内开展反右派斗争时，王缵绪的叛国活动更加嚣张起来，声言在大陆一天也住不下去了，叫陈约雷见面，积极策划逃往香港。王缵绪对陈、雷二人说，到香港后，他就给蒋介石发电报，召集新闻记者发表谈话，将反动文件翻印散发，到联大去代表六亿人民控诉共产党，向美国

(注 51 页介绍：当国共内战刚兴起时，蒋就派蒋经国和余济时到王缵绪家转达圣意：“派两架飞机嘱王缵绪迅速将其大量文物、字画及家眷送往台湾。”王拒绝理由是“抗战八年他拒敌之外，就是毛泽东把所有野战军都调来，也难攻蜀地之坚定信心。”因此蒋作罢，并在军委会上宣布：“驻守四川非王缵绪莫属！”这一事实，在大陆拍摄“解放大西南”的影视上有所交待。所以，王缵绪出境目的就是到香港向“联合国大会组织”可称（联大），反映国内历次运动整人，为所有受害者呼吁！若王缵绪想去台，早就带着大量家藏和家眷走了。)



外逃。

根据案情的变化，四川省委指示：如王偷越国境，即逮捕破案。如其暂不外逃，拟先传讯参与王逃港阴谋活动的雷绍成，取得口供后，由统战部出面找王谈话，责令交待，若王拒绝交待，依法处理。省公安厅派办案同志去北京向公安部汇报。公安部一局领导听取了汇报并认真审阅了罪证后指

示：王若偷越国境应该依法逮捕。如其暂不逃港，可暂缓处理，继续侦察监视，进一步了解他的阴谋活动，取得王进行叛国活动更有力的证据，然后视发展情况，选择适当时机破获全案。此意见上报后，罗瑞卿部长

罗瑞卿部长对王缵绪案的批示
请愿，要求发动战争，消灭共产党。雷就趁机骗王说：台湾联络员现在重庆，可以护送王从广州外逃。王表示赞同，叫雷先到重庆与“联络员”研究外逃计划。1957年9月3日雷与王缵绪商定10月份

(注：52页介绍：专案组的秘密行动，把王缵绪骗到杭州想抓捕，但上报到罗瑞卿，认为没有确切证据，阻止抓抗战时期四川省主席、抗战名将王缵绪上将，况且把他定为起义将领。)

案例选编 ●

在报告上批示：“王是极端的反动分子，且对四川人民犯了很多罪，如能抓住理由把他整掉，当为四川人民出一口大怨气。”四川省公安厅按照这些精神，继续对王侦察监视。

随案侦察 欲擒故纵

王缵绪按与雷绍成商定的计划，决定先到重庆会见“联络员”，然后从广州外逃。他把各类反动文件藏在随身携带的预先做好的皮箱夹层中，于1957年10月20日同雷、陈一起离开成都到了重庆。

省公安厅党组派了掌管此案的干部随案侦察，密切掌握他们的一切动向；同时重庆市公安局也布置了外线监控。

到重庆后，王叫陈随他住在其四妾家中。我们侦察干部也住进了附近的旅馆，与特情保持联系。王对雷存有戒心，不直接和雷见面，嘱咐陈：凡雷约他与联络员

会面，他都不直接去，防止雷勾通共产党“陷害”他；还准备采取突然见雷、许诺给雷一大笔钱的办法，试探雷的可靠程度。此时，雷觉得在重庆仍然达不到目的，遂决定继续引王外逃，拿了一封“联络员”已去广州等候的信交王。王深信不疑，决定1957年11月7日乘船经武汉去广州。

侦悉这一情况后，我们于11月4日将省委的“待王到达长沙时即予逮捕”的意见报告公安部。公安部一局指示：如果王逃走时确实携带着反动文件，可以在长沙逮捕，当场搜获反动证据。如搜获反动证据无把握，可暂不动手，待他逃到边境时再逮捕。如王中途折返，则暂不破案，继续监视其行动。罗瑞卿部长批示：“不要惊动他，不管怎样，均以到边境捕起为好。”

1957年11月12日晨，王、雷、陈抵广州，我侦察人员也随案到达。王缵绪一到广州，即要雷引

53

(注：53页介绍：后骗到广州想行动，也因没有足实把握，到了深圳若再不抓人，就没机会了。)

见“联络员”，想和联络员接头后即把雷甩掉；若无联络员即自杀。此时雷决定找一走私客冒充“联络员”引王外逃。

将计就计 制隙进攻

上述情况说明，王外逃坚决，如果雷在广州找到走私客或敌特分子引王外逃，对我危害很大。为此，我除继续布置陈严密监视王、雷的行动、防止王自杀外，经同广东省公安厅研究决定，由广州市公安局选派了熟悉港澳情况的侦察员郑仕成和雷接触。我们分析：当时广州市正在开展群众性的反走私运动，雷人地生疏、异地口音、情况不明，利用雷急于要找人的心情，我侦察员以走私客面貌同雷接触是很合乎情理的。

于是，当晚我侦察员乔装成港澳回国同胞住进雷的隔壁房间，果然雷探头探脑地观望。侦察员操着广东土语随意问雷从何地来？雷听不懂；再改用普通话问，

54

雷答从河南来。侦察员又问贵姓？雷答姓田，反问侦察员从何地来，侦察员答香港。雷听说其从香港来，顿觉兴奋，便问侦察员是干什么的、怎样来的、香港的情况等。

侦察员以“走私客”的口气问雷买不买手表。雷觉得有了门路，便透露同他来的还有一个张先生（指王）很有钱，要买表，先问问他再回话。

雷与我侦察员分手后即告王璇绪，诡称已会到台湾联络员，出国无问题。此时，王外逃在即，遂深信不疑，要雷明晨引见。因为雷还没有和“走私客”讲明情况，但为了应付王璇绪，想将这一“走私客”冒充台湾联络员和王见一面，后很快辞走，是不会出问题的。于是第二天清晨雷即以王要买手表为名，带“走私客”会见王璇绪。由于我侦察员沉着老练，装束举止无任何破绽，王璇绪毫不怀疑，一见面便说：“盼望你们几年了。我箱子里装的都是文件。上面写的，

（注：54页介绍：所以提前布控，非法抓捕，提前写好报道当天发表，称“反革命分子越逃”等内容。引起世界震惊，后续三年，也再无报道内容，既不审判、也不定罪、无判刑也不可入狱，被关押在省公安厅看守所内三年之久，让他与世隔绝。却有人向他透露：“已内定关押致死”。）



王缵绪被我捕获的现场

都是我亲眼看到的事实。我只要求出去,尽快走。”侦察员以双关口吻,暗示环境不便深说并很快辞走。雷见事已至此,对“走私客”假称王是民生轮船公司董事长,很有钱。他女婿在国外,想到香港看病,请护送逃走,并以三千港币酬谢。

王见过“联络员”后情绪大

会议,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起义将领纷纷揭露控诉了王缵绪的罪行,一致通过撤销王的省政协委员和省参事的职务,并在《四川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布了消息,省公安厅举办了王的罪证展览。周恩来总理指示要对王缵绪公审判决。由于王不久病死狱中,未能执行。

55

(注: 55页介绍: 当王缵绪知到他们意图后, 以绝食抗争致死, 谎称“病死”。至今有关王缵绪的“51份反右剪报”及52万字所谓的“反革命材料”, 以及“反动宣言”, 也不退还家属, 并由省公安厅回复称: “没有给王缵绪定罪, 不存在平反问题, 纠正问题, 对子女亲友不受影响。特此函复。)

(附：经王泽东几年上诉，由四川省公安厅回函内容。)

四川省公安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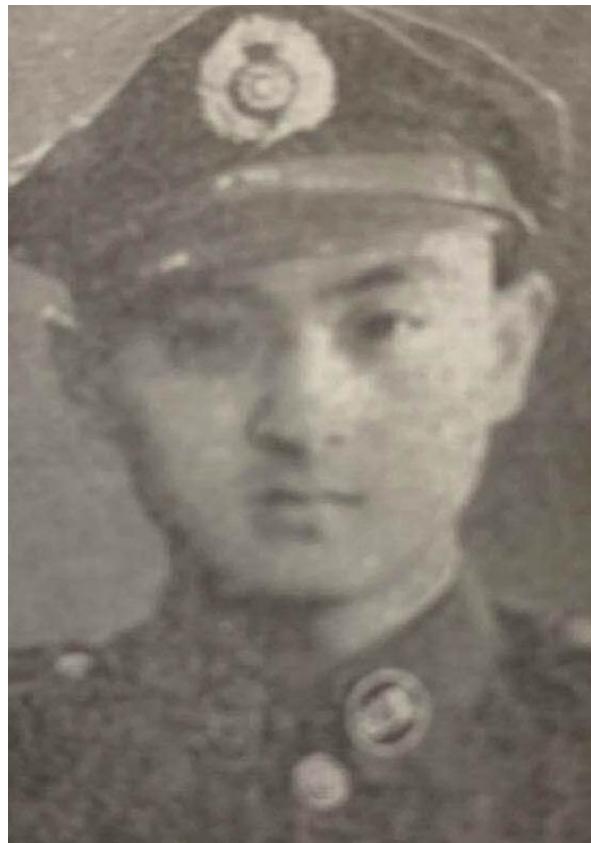
王泽东先生：

八五年七月，你们致信邓小平同志，要求对王缵绪平反。中央将此信转来我厅。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复查和调查，王缵绪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携带大量本人书写的反革命材料，越境外逃，被边防军逮捕。尚未判刑，王便病死于狱中。因此，报经中共四川省委、公安部批示同意：对王缵绪本人不存在平反、纠正问题，也不存在发起义证的问题。对子女亲友不受影响。特此函复。



王泽东先生：八五年七月，你们致函邓小平同志，要求对王缵绪平反。中央将此信转来我厅。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复查和调查，王缵绪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携带大量本人书写的反革命材料，越境外逃，被边防军逮捕，尚未判刑，王便病死狱中。因此，报经中共四川省委、公安部批示同意：对王缵绪本人不存在平反、纠正问题，也不存在发起义证的问题。对子女亲友不受影响。特此函复。四川省公安厅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一日。

附：《王泽东简历》



抗战名将王缵绪五子王泽东中校营长

王泽东，1930年出生重庆，后改名王立新（是本人不愿与毛泽东同名）。

1935年至1948年，王泽东在父亲王缵绪创办《重庆私立巴蜀学校》读书。1948年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本校成都），为黄埔军校第二十二期二总队步七队。毕业调台湾东南长官公署，放弃赴台经国防部改调贵阳宪兵十二团任少尉队长。

因国共内战，王泽东从贵阳返成都，其父王缵绪上将是国民党最后驻守大陆的最高军政统帅，奉蒋之命手持国民政府八千份委任状，负责把三大战役的败退四川上百国军官兵收入麾下，王缵绪是指挥“成都战役”的不败之将；他把蒋交于所有军政机构，以方便起见，改称《成都治安总司令部》简称“治总部”任总司令。

王泽东是王缵绪第五子，任“治总司令部”警卫团中校营长，他率三个连兵力战斗，受当地民众及袍哥组织拥戴，迅速增加数万人命名“反共救国军”。王泽东任“反共救国军”司令，率军朝西昌方向沿新津、邛崃、大邑进攻，与共军战斗。

1949年12月25日，其父已是国民党驻守在大陆唯一的上将，由王缵绪在成都召集党军政各界机构人员，正式向全世界宣布“四川和平解放”，12月31日同意中共贺、刘、邓大军入城。

1950年，王泽东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就读；因其父王缵绪不接受中共所有任职，也不与中共高官及变节者们共舞。川中以刘文辉、邓锡侯等人得势；像这类人及后代们要比刚进城农民起家者有文化。于是统统安排在省市历史相关文档等重要部门任职，经历次运动无人关心史料，他们便随手将历史改得面目全非，不外乎是把自家长辈描写如何重要，称蒋最怕的川中实力；把王缵绪、王泽浚抹杀构造成反面人物。

于1951年3月27日以“反革命”将王泽东被捕入狱，后流放阿坝州劳动改造。他走遍雪山草地，每天干着超强度的苦役共30多年，一直到1981年释放回蓉。因过60岁超工作年限，父母早就在双亡，自己是未婚入狱，出狱也无家可归。在一无所有情况下靠国外亲友资助及学友帮忙；因自己与社会隔绝大半身，很不适应，尝试多行糊口。在困境中，王泽东为其父冤屈不停上诉，所写上诉书稿几十万字之多。劳改时落下多病，晚年一无生活来源，二无医保，最后是自生自灭，病死在成都一破旧小屋，了却一生。

可多年来在叙事上存在关键偏差：一是将国民政府首任抗战初期四川省主席兼四川省军管区总司令、四川省保安总司令王缵绪上将排除历史之外，将川军在第五战区归在张自忠名下；将王缵绪指挥第六、第九战区归西北军孙连仲“指挥”，彻底否认了王缵绪作为四川省军政与各战区任副司令长官的实际指挥等诸多战役。经结合《第六战区阵中日报》、《第九战区作战档案》、《武汉行辕政务纪要》，及台湾国史馆收藏电文史，而证实王缵绪上将在第五、第六、第九战区作战指挥屡屡战功，都实现他的战略战术攻破日军侵略；二是抗战后，国民政府“行辕-绥靖区”体系中，王缵绪军政权力仍为四川局势最关键人物；三是由王缵绪宣布“四川和平解放”，这对历史产生了重大意义。

我是通过所有档案的原始史实，呈现出国军上将王缵绪，是我国具有实际的重大贡献、是名副其实的抗日将领！以四川军政事实，纠正七十多年对川军而言，不包含刘湘出川在内。（从1938年2月-1945年8月，史称八年抗战。）这八年川军抗战进行史与战绩已被抹杀，与战后的四川政局认知偏差等事实，对王缵绪历史形象曲解或排除，若否定他的存在，那么我国八年抗战历史就不真实可信！王缵绪应作为“爱国将领”与“和平推动者”的典型，将载入中国近现代史册之中。

作者：王复加（王缵绪嫡长孙）